



學海一牛鳴

錢仲聯
著



明代山人文學研究

張德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學海一牛鳴

錢仲胆
著

明代山人文學研究

張德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山人文学研究 / 张德建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2

ISBN 7-5438-3884-2

I. 明... II. 张...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
国-明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1636 号

责任编辑: 曹有鹏

特约编辑: 张 晓

装帧设计: 陈 新

明代山人文学研究

张德建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富洲印刷厂印刷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字数: 313,000

ISBN7-5438-3884-2
I·397 定价: 24.50 元

编者的话

《学海一牛鸣》是一套学术著作丛书，专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著述。

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空前活跃，并越来越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古为今用，更快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套丛书旨在为最新研究成果提供一个学术园地，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深入与繁荣。我们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积数年的努力，出好这套丛书。

“一牛鸣”除字面一般意义以外，又为“一牛吼地”^{*}之简称，指牛鸣所及的距离。这套丛书兼取二者之义，凡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问世，即犹如牛之一鸣，其声宏亮，必然飞震林樾，闻于远处。学海茫茫，添一新作，又说明著述者已向前跨越一新的里程。

蒙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为丛书题签，谨此致谢。

湖南人民出版社

* 一牛吼地，梵语长度单位“拘卢舍”的意译。《大唐西域记》卷第二《印度总述·数量》：“拘卢舍者，谓大牛鸣声所极闻。”

内容提要

本书以明代山人群体及其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山人群体的生成机制、群体构成、生存方式及其文化品格，在此基础上，对山人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本书认为明代山人群体是明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产物，山人在社会的挤压下，在专制制度的空隙生存，造成了他们的畸形心态和萎靡人格。随着山人群体的扩大和文化影响力的增强，通过调和精神解脱与生活享乐、文化传统与现实需要，山人终于成为晚明文化的代言人。

绪 论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个干流，首先是上层社会文化，从阶级上说，即封建地主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其次是中层社会文化，即城市人民的文化，主要是商业市民所有的文化；最后是底层社会文化，即广大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这三种文化在不同时代的地位和影响各不相同，上层社会文化始终是正统文化，是社会的主导文化，而中、底层社会文化则在正统话语的压制下顽强成长，并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获得发展。在文化发展中，城市商业文化大有后来崛起之势，特别是在明代。随着明代社会的变化，封建上层文化与中层城市商业文化呈现并存现象，甚至有后来居上的趋势（仅就其在现有评价体系中的文化成果而言），城市商业文化不仅影响着城市市民，也影响着士人阶层。表现在文学上，上层社会文学即所谓雅文学与中、底层社会文学即所谓俗文学是两股最大的势力，而俗文学以其突出、鲜活的创作出现在文坛上，日渐壮大，与雅文学并驾齐驱。由士大夫到市井平民，文化权力不再被少数士大夫精英所掌握，城市市民和广大农民同样

以其文学作品获得了文化上的发言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权力的下降。

但这种分析还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而且这种文化层次的划分完全依据阶级尺度。实际上，阶级内部也有不同的层级。就上层社会而言，当统治阶级无法完全、充分地分配其有限的资源时，就会在同一阶级中产生不同层级。在自隋唐以来形成的中国传统社会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官社会中，自然造就了高层官僚与中下层官员两个层级，而不能入仕的士人达到一定规模时，也形成另一个层级。当阶级缺乏足够的组织或权力完全控制“文化权力”时，也就产生了一个文化再分层现象，即在某一个文化层次上，文化权力进行再分配。

这里，我所要研究的是明代上层社会群体的再分层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分层现象的一个方面。

明代上层文化分层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只不过研究者多注意于雅、俗即上层文化与中下层两种文化的升降，忽视了雅文化内部发生的变化。通过研究明代雅文化的发展，我们认为，可以分三个层次：台阁文化、郎署或称曹僚文化、山林文化。台阁文化是指以大学士及翰林院官员为中心形成的，代表高层士大夫群体的文化；郎署或曹僚文化是指以六部、科道及府县官这些中下层官员形成的群体文化；山林文化则是指不出仕或未能出仕的士人所代表的群体文化。这个分层主要依据各群体在上层社会中的不同地位而划分，同时，这个划分也隐含了对明代上层文化变迁过程的历史描述。这三个层级的发展、演变构成了明代社会文化史上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更为丰富的是他们所代表的文化（集中表现在文学思想、风尚、流派的嬗变）变迁。明代山林文化也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从明初的隐士，到弘治、正德间的

才子，再到嘉靖、万历以来的山人，最终是嘉、万以来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名士群体。对这一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不是本书所能够承担的，本书所研究的只是山林群体及其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山人群体及其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文化意义。

明代山林之士即中下层文人有多种称谓方式，如山人、布衣、处士、隐君、逸士、名士等。人们在使用这些称谓时，称谓对象也很复杂，或指隐士，或指文学之士，或指下层士人，或指中下层绅土地主。“山人”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一个称号，上至高官，下至士人、技艺之士，很多人以山人自称，因而社会上逐渐把“山人”称号定位于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这个群体逐渐形成士人社会的一个阶层，成员构成、谋生方式、活动方式、精神风貌都具有相同的特征，甚至有了阶层意识。这个群体就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山人群体。

什么是山人呢？在论文中，我通过对大量明代文献的征引，将山人界定为以诗文书画为工具，干谒权贵，并不断地流动，以获得“幕修”或赠与为最主要目的的一个士人社会群体。类似于以明代山人的方式谋生的人历代并不少见，但形成一个群体还是在明代。山人群体出现于明代成化（1465—1487）年间，至嘉靖、万历（1522—1619）间而大盛。他们的社会身份比较复杂，其中既有获得科名的诸生、贡生，有时称为文学生、太学生；也没有任何功名的人，真实的社会身份应该是布衣；还有较高功名的举人、进士，黜落官员、失职武官也有成为山人的。山人群体的主体是具有一般功名的诸生、贡生及布衣。山人群体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严格的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拒斥，大量士人不能进入士的最高层级，国家容纳不下日益增多的士人，而士人又没有别的出路，为了谋生，不得不以他们的文艺才能取得生活资料，成为

山人。明代以前及明初，在科举制之外，还有荐举制度作为取士的补充，明代中期以后，荐举才能之士，搜访遗逸的政府行为不复存在，科举失败的士人连这条路也被堵死。明代也没有一个可以容纳失意士人的幕府制度，所谓幕客、门客只是制度外的谋生之路，没有任何保障。明代山人大多是江南一带人士，这里正是明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发达的经济所导致的商品消费和人生欲望的高涨，使得士人不能再安于贫贱的生活，传统的隐逸文化对他们来说不再具有真实的生活意义，而只有精神上的关联。江南一带也是文化中心，广泛而丰富的交游活动刺激了士人，他们不再安于一隅，而希望增广见闻，或四处游动，或结社唱和，流连诗酒，或历览名山大川，足迹几遍天下。山人群体的出现是明代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他们是社会的产物，却又被社会制度化抛弃，只能在社会的缝隙中生存。

余英时在讨论汉魏之际士的新自觉与新思潮时，从士人重交游论起，以此作为士人群体自觉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于迎春《秦汉士史》第十三章承此观点，指出东汉后期以来，周游而学、转益多师的风尚在转变着学术习尚的同时，也体现并完成着士阶层内部的新的关系形态。全国各地的士人有可能打破地域分野的限制，有助于文化的活化、传播和再造。同时，这种广泛的社会活动也推动了士人突破诸种限定，是对传统价值的背离，形成立场鲜明的批判性社会政治舆论。这个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士阶层变迁的角度。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如果说汉代的统一帝国促使先秦“游士”完成了向“士大夫”的角色转换，那么“游学”就是在士大夫体制下重建群体自我的努力。更进一步，科举制施行以来，“游学”又一变而为“游历”，他们纵游名山大川，与天下名士豪俊上下其议论，从而保持了士人一定程度上的独

立，相互切磋，互相激励，使士人得以在固定的政治体制下获得群体的自我激活。明代士人的“学”被固定在科举制度上，但他们也努力突破这种被固定而导致的自我僵化的命运，弘治、正德以来，以吴中四才子为中心的士人活动，各种文学结社活动、文学集团和文学流派的空前活跃，以及广泛的讲学活动，都可以视作士人保持群体活力的努力。在广泛而普遍的交游活动中，有一种新型的活动开始出现，我们可以称之为“游客”，它与先秦游士的游食四方，汉代士人的游学不同，也与唐宋以来士人的游历不同，而带有明显的依附性、寄生性，在社会的缝隙中生存，这种活动的主体就是山人群体。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出发，还会发现山人群体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具有突破性意义。余英时指出：从“游士”到“士大夫”是中国知识阶层的一个最基本的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与宗族紧密结合的士族化，一是与田产结下不解之缘的地主化，“使士在乡土生根”。^①这个庞大的特殊阶层，成为治理国家的强大后备军，在未进入官僚政府之前，他们也负有重要责任。张仲礼从正面分析了绅士阶层的社会作用：“绅士作为一个居于领袖地位和享有各种特权的社会集团，也承担了若干社会职责。他们视自己家乡的福利增进和利益保护为己任。在政府官员面前，他们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建公共工程，有时还组织团练和征税等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以及这些的物质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页77。

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① 张仲礼此处所论虽为清代绅士，但与明代的情况相去不远。顾炎武则从反面分析揭示了这个阶层中“生员”的种种恶劣行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之为市者，生员也”^②。甚至将生员与乡宦、胥吏并列为“天下之病民者”。

山人群体是不能成为士大夫的士，再次成为“游”士，但时代的变迁及政治制度、取士制度的固定化使他们得不到战国之士受到的礼遇，而成为一个寄生群体。这一变化在明代更加突出，而更为突出的是山人失去了士族化和地主化这两个依托。山人群体的身份构成并不相同，有的有田土近千亩，大多数则并非有影响的乡绅地主，有的甚至连小地主都算不上。大多数山人出身低下微贱，家境贫寒，这些人多是穷诸生、穷食客，不得不依附于缙绅之门，侍候大家公子读书，或奔走四方，投入乞食。总体上说，他们属于“小乡绅”之列，自然谈不上宗族化。俞允文、谢榛、卢柟、王逢年、余安期、唐诗、沈明臣、张之象、吴扩、沈仕、黄克晦、王寅、莫叔明、宋登春、吕时臣、周天球、童佩、顾圣之、陈昂“皆布衣崛起，无所因藉”。他们中一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只相当于城市平民，如陈昂。他们是“士”，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声誉，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其实很低，处于“士”与

① 张仲礼：《导言》，《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页48。

② [清]顾炎武：《生员论中》，《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页22。

“民”之间。即使那些名山人与宗族的关系也不很紧密，他们游于四方，四处奔波，自然切断了与宗族的密切联系。这样，山人群体中的大部分人就无法发挥张仲礼所论的绅士阶层的正面作用，也没有力量对社会构成危害。

失去了这两层保护，山人只能靠干谒求乞，寄食四方，境况凄凉。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有，但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还是在明代。当然，这种变化并没有引发出社会结构的变动，一方面因为山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且只是一个松散的群体，为了生活而奔走权门，无法形成促进变革的力量，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另一方面，山人只是明代士人阶层内部的一个层级，他们只对个体如何在社会上生存感兴趣，对整个社会制度很少进行理性的思考。作为士人阶层的最下一层，他们在根本上是维护现存制度的。例如，山人大部分是科举失败者，很多人对科举抱着非常矛盾的态度。他们对科举十分厌薄，但这只是性情上的，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多次应试，只是由于命运多舛，才没能取得更高的科名。

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这些下层士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总体而言没有多大变化，但文化地位开始提升。明初，馆阁文学还占有优势，宋濂《汪右丞诗集序》：“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① 邢云路也曾说：“明兴，文教烨雪，十九辇上，君子

①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峦坡前集》，卷七，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第一册，页481。

委蛇操觚，韦布之士董董耳。”^①此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李东阳就曾将“馆阁之文”与“山林之文”并提。^②弘治、正德之际的吴中作家群中除了吴宽、王鏊外，文徵明、祝允明、唐寅虽有一定的功名，但也以布衣自命，其他人皆为布衣之士。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疏离庙堂文化，转向山林乃至市井文化，显示出在野之士卓然自立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心态。随着复古运动的开展，台阁文学势力逐渐被曹僚所取代，陈田曾引黄道周语云：“嘉靖初年，议臣鸷起，文章之道散于曹僚，王弇州、李历下为之归墟。”^③实际上，“文章之道散于曹僚”应始于弘治间的前七子。早在弘、正间前七子盛行之际，山人就依附于复古阵营，如程诰、黄省曾依于李梦阳，孙一元依于郑善夫等。嘉靖、万历以来，山人与后七子的关系非常密切，除了徐渭同他们没有往来以外，其他人都极力依附。山人通过依附于文学集团，扩大了山人群体的文学影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时，以山人为代表的山林文学开始以一个庞大的创作群体出现于社会上，享有很高的文

① [明]邢云路：《刻谢茂秦诗序》，[明]谢榛撰，朱其铠、王恒展、王少华校点：《谢榛全集》卷首，（山东：齐鲁书社，2000），页12。

② [明]李东阳：《倪文僖公集序》：“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其体则清耸奇俊，涤陈薙冗，以成一家之论。二者，固皆天下所不可无，而要其极，有不能合者。”[明]李东阳撰，周寅宾点校：《李东阳集》（湖南：岳麓书社，1983），《文前稿》，卷九，页128。

③ 陈田辑撰：《明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庚签，卷二十三“姚希孟”，页2659。

学地位，如赵康王序谢榛诗时，论及正、嘉以来文坛，于王、李之外，“乃于隐逸，爱取三人：孙太白、张昆仑、谢四溟”^①。邢云路称谢榛于后七子“以布衣祭酒”^②。汪道昆在《蓼蓼集序》中对“大方家”论当世之诗，“上不在台阁，下不在山林”的观点表示异议。^③万历中期以来，山人的文学和文化地位空前提高，“吴门自文待诏歿后，风雅之道，未有所归，伯谷（王稚登）振华启秀，嘘枯吹生，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④。陈继儒更声名远播，倾动寰宇。程嘉燧《陈眉公七十赠诗》：“山中宰相神仙策，海上园公绮季心。”^⑤王思任在《晚香堂小品序》中赞陈继儒：“天固忌之，不以白衣牵帝座，而使之山中宰相以老；弱其雄心，以写景标韵于水山僧鸟之际。”^⑥吴从先曾辑明代三百年

-
- ① [明]朱厚煜：《四溟旅人诗序》，[明]谢榛：《谢榛全集》，卷首，页9。
- ② [明]邢云路：《刻谢茂秦诗序》，[明]谢榛：《谢榛全集》，卷首，页12。
- ③ [明]俞安期：《蓼蓼集》（[明]万历刻本），卷首。
- ④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丁集中，页482。
- ⑤ [明]程嘉燧：《松圆浪淘集》（[明]崇祯谢三宾刻[清]康熙三十年〔1691〕陆廷灿补修《嘉定四先生集》本），《尝甘》卷十八。
- ⑥ [明]陈继儒：《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明]汤大节蘭绿居刻本），卷首。

布衣之诗，名《布衣权》^①，更显示了明代山人文化地位不断上升的事实。它表明明代的布衣诗人（主要是山人）已经逐渐成为文学界的重要角色，在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晚期山人不再幻想隐居田园，杜绝人事，而是隐于市，既得世俗之乐，又享隐逸之福。同时他们还开始进行艺术经营活动。以陈继儒为例，他延招吴越间“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部分族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萃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②。这样一来，陈继儒名利两收，一改山人寒乞之态。晚明有一大批失意士子加入到图书的编纂、出版活动中，这是很具新意的活动，耐人寻味。它一方面使山人摆脱了依附于人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扩大了山人的影响，提高了山人的文化地位。晚期山人的影响力还表现在山人文化已被社会广泛接受，晚期山人所倡导的清雅闲适的生活习尚和抄撮古人成语为书的风尚波及了整个文人阶层，甚至影响到了各级官员，

① [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四，《广快书》提要：“从先尝选明一代布衣之诗，名《布衣权》。唯紫淀老人张文峙家藏有写本，明季兵燹遂亡佚。”页1138。卷一百八十，《射堂诗钞》提要云：“闵景行辑《明布衣诗》，称梦阳为明布衣之冠。”页1630。周亮工：《书影》（十卷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六，页170：“徽人闵景贤，字士行，常（应为“尝”）刻《快书》前后百种，犹是何伟然、吴从先恶习，皆不足观。独所辑有明三百年布衣诗二尺许，颜曰《布衣权》，搜罗最广……己卯（1639）过予赖古堂，出此书相订，意欲予为之镌行，会予赴北海，不果。……或曰：‘《布衣权》犹有副本，在紫淀老人张文峙家。’文寺归道山，此书不知所归矣。”未知孰是。

②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陈征士继儒”，页637。

不只是一些失意士子。四库馆臣常以“山人结习”、“山人之习”称之。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引发出社会结构的变动，一方面因为山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且只是一个松散的人群，为了生活而奔走权门，无法形成促进变革的力量，他们也没有这样的意识；另一方面，山人只是明代士人阶层内部的一个层级，他们只对个体如何在社会上生存感兴趣，对整个社会制度很少进行理性的思考。作为士人阶层的最下一层，他们在根本上是维护现存制度的。他们的成功主要表现在文化上，以独特的人生体悟，通过吸取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思潮的活力，调和精神解脱与生活享乐，创造出了能够代表群体自我的新型文化产品——小品，成为晚明文化的代言人。不过，这种努力却由于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遭到了来自学者和官方的双重批判，最终夭折。明代山人在清代发生了分层演化，上层人物成为幕僚，下层人物成为师爷，我们可以用“衙门行走”来概括他们的身份特征。

赵翼总结有明一代的文学时，曾将明代文人分为四类：一类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的翰林学士，一类是进士出身，官部郎、部曹、中书舍人、中书行人及知县者，一类是举人出身者，最后一类是不由科名而才倾一时者。翰林馆阁诸公在明代文学中地位不如前代，赵翼说：“一代之中赫然以诗文名者，乃皆非词馆。如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所称四大家者，皆部郎及中书舍人也。”而那些“不由科目而才名倾动一时者，王绂、沈度、沈粲、刘溥、文徵明、蔡羽、王宠、陈淳、周天球、钱穀、谢榛、卢柟、徐渭、沈明臣、余寅、王稚登、俞允文、王叔承、沈周、陈继儒、娄坚、程嘉燧，或诸生，或布衣山人。各以诗文书

画表见于时，并传及后世，回视词馆诸公，或转不及焉”^①。可见明代山人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四库馆臣在编辑《四库全书》时对山人屡加指责，以之作为明代浇离之习的代表，但反过来看，不正证明了明代山人在明代的文化地位和影响吗？

二

山人是一个备受歧视的群体，饱受各方的冷眼，连山人自己也不得不要有所表示。正统势力甚至将士风败坏之责推到他们身上，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册封皇太子，诏书内有驱逐山人的命令。在清代，山人也成为攻击目标。乾隆间开馆修四库全书，是山人受到集中攻击的一个时期。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山人”意味着附庸风雅，山人的文化产品——“山人小品”一词则意味着“语意纤仄”、“割裂铨订”、“词意儇薄”、“混漾自恣，不轨于正”。晚明山人的很多著述都被列为禁书，如徐渭、王稚登、陈继儒。周作人曾说：“清朝士大夫大抵都讨厌明末言志派的文学，只看《四库书目提要》骂人常说不脱明人小品恶习，就可知道。这个影响很大，至今耳食之徒还以小品文为玩物丧志，盖他们仍服膺文以载道者也。”^②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股小品文热，以晚明小品为榜样，提倡小品文写作，并在晚明小品文与新文学运动的

①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39年世界书局本），卷三十四，“明代文人不必皆翰林”，页493。

② 周作人：《苦茶庵小文》，《夜读抄》（湖南：岳麓书社，1988），页193。